

土地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韩 峰 庄宗武 谢 锐

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网277个地级市土地市场交易数据测算城市土地资源分配指标，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而从城市土地资源分配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推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存在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倾向，这种反向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弱化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加剧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效应；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上述结论表明，进一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阶段保持制造业快速增长、推进出口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土地资源分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偏向性配置；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1) 12-0118-16

引 言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制造业集聚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快速提升（张杰等，2013^[1]；Kee and Tang，2016^[2]）。根据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经验，制造业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的不断提高也相应伴随着产品附加值的稳步提升。然而现实经济实践和现有研究均指出，中国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依然偏低，正面临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巨大瓶颈（刘斌等，2016）^[3]。中国制造业发展一直存在着“制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的现实困境。土地作为制造业生产中必需的要素投入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其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势必会影响到制造业产业模式及其生产经营行为，进而

[收稿日期] 2021-07-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空间集聚优势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机制、效应识别与政策优化”（72073071）；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产业集聚推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机制与政策研究”（BRA2020295）

[作者信息] 韩峰：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庄宗武（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zongwu0601@163.com；谢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DVAR) 产生重要影响。从城市土地资源分配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攀升的作用机制, 可为“制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的现实困境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并由此探寻破解制造业出口产品低附加值困境, 进而推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可行路径。

在中国, 政府对土地资源分配的方式、结构及数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受政治晋升和财政最大化驱动, 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存在着竞相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和降低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格的竞争 (杨其静等, 2014)^[4], 使得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大大低于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 (谭洪波, 2015)^[5]。大量城市建设用地被配置于工业领域且价格被严重低估, 造成众多资本密集型企业 and 低效率企业为追逐“地租优惠”而非市场效率在城市集聚, 土地配置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自身利益而非市场力量的左右。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土地自身的利用效率, 更会影响与其密切联系的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配置状况, 并最终对制造业生产率 and 出口行为及其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产生影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 研究和识别土地资源分配对制造业出口 DVAR 的作用机制, 对于化解土地资源错配、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和贸易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文献主要从制造业服务化 (许和连等, 2017)^[6]、市场分割 (吕越等, 2018)^[7]、外商直接投资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8)^[8]、国家内部行业结构 (李胜旗和毛其淋, 2017)^[9]、要素市场变化 (高翔等, 2018)^[10]、贸易自由化 (Kee and Tang, 2016;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9^[11])、政府补贴 (许家云和徐莹莹, 2019)^[12] 等方面来阐述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 DVAR、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但尚未有文献注意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分配对制造业出口 DVAR 的影响。本文将在系统识别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 使用 2006—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277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城市土地交易数据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路径及实现机制。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首先, 聚焦制造业快速发展背后的土地资源分配因素, 从企业成本变化、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集聚效应以及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 DVAR 的影响机制, 为理解制造业出口产品低附加值困境的制度根源和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其次, 本文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土地市场网^①收集了 2006—2013 年全国 277 个地级市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实际交易数据, 结合生产函数法对城市建设用地错配程度进行度量; 其三, 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导致土地资源错配, 进而对制造业出口 DVAR 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本

^①<https://www.landchina.com/>。

文进一步对这两类导致土地资源错配的深层次体制性原因进行了直接探讨；最后，从企业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所在地区以及城市规模等多维度进一步拓展研究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 DVAR 的影响效应。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单纯的出口规模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优势和贸易利得，而企业从出口中获取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和大小则可作为衡量该国或地区制造业价值链增值水平及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准（Kee and Tang,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本文将在 Halpern 等（2015）^[13]、Kee 和 Tang（2016）综合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企业出口 DVAR 决定模型，进而依据该模型梳理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DVAR 的作用机制，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借鉴 Halpern 等（2015），假设企业 j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和交易，且企业 j 生产需要投入劳动力（ l ）、资本（ k ）、土地（ G ）和中间品（ M ）四类要素。代表性企业 j 的生产函数可设定为： $Q_j = A_j l_j^\alpha k_j^\beta G_j^\eta M_j^\gamma$ ，其中， A_j 为希克斯中性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α 、 β 和 η 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 γ 度量了中间投入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程度，且满足 $\alpha + \beta + \eta + \gamma = 1$ 。本文根据 Halpern 等（2015）的研究，假定劳动力（ l ）、资本（ k ）和土地（ G ）预先给定，并通过确定均衡状态下中间品的数量组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中间品数量 M_j 由国内中间品数量（ M_{jD} ）和国外中间品数量（ M_{jF} ）组合而成。即： $M_j = [(\varphi_j M_{jD})^{\frac{\theta-1}{\theta}} + M_{jF}^{\frac{\theta-1}{\theta}}]^{\frac{\theta}{\theta-1}}$ ，其中， φ_j 为国内中间品的效率参数，且 $\varphi_j > 0$ ；由于国外中间品效率参数取决于国外厂商的技术水平，可视为外生。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将国外进口中间品效率参数设定为 1； θ 为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且 $\theta > 1$ 。根据 Kee 和 Tang（2016），国内中间品数量（ M_{jD} ）和国外中间品数量（ M_{jF} ）可看作不同种类国内中间品和国外中间品的 CES 组合，即： $M_{jD} = [\sum_{i=1}^{ID} m_{j,iD}^{\frac{\lambda-1}{\lambda}}]^{\frac{\lambda}{\lambda-1}}$ ， $M_{jF} = [\sum_{i=1}^{IF} m_{j,iF}^{\frac{\lambda-1}{\lambda}}]^{\frac{\lambda}{\lambda-1}}$ ，其中 ID 、 IF 分别为企业 j 可获得的国内和国外中间品的数量； λ 为中间品替代弹性，且 $\lambda > 1$ 。若国内外中间品价格分别为 P_{jD} 、 P_{jF} ，则复合中间品 M_j 的有效价格可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得到。即：

$$P_{jM} = [(P_{jD}/\varphi_j)^{1-\theta} + P_{jF}^{1-\theta}]^{\frac{1}{1-\theta}} \tag{1}$$

相应地，国内中间品和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则可表示为 $P_{jD} = [\sum_{i=1}^{ID} p_{j,iD}^{1-\lambda}]^{\frac{1}{1-\lambda}}$ 和 $P_{jF} = [\sum_{i=1}^{IF} p_{j,iF}^{1-\lambda}]^{\frac{1}{1-\lambda}}$ ，其中， $p_{j,iD}$ 和 $p_{j,iF}$ 分别表示每种国内中间品 i 和国外进口中间品 i 的价格。可见，国内外进口中间品价格均会随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而减少，中间品价格是中间品种类的递减函数，即 $\frac{\partial P_{jD}}{\partial ID} < 0$ ； $\frac{\partial P_{jF}}{\partial IF} < 0$ 。

在 Kee 和 Tang (2016) 的研究中,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VAR) 取决于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 即:

$$DVAR_j = 1 - \frac{P_{jF}M_{jF}}{P_jQ_j} + \phi_i \quad (2)$$

其中, P_j 为企业 j 最终产品价格, ϕ_i 为经典回归中的误差项, 用以捕捉不可观测项 $\frac{\delta_j^F}{EXP_j}$ 。若 C_j 表示企业 j 生产最终产品 Q 的总成本, 则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占

总产出的份额可表示为 $\frac{P_{jF}M_{jF}}{P_jQ_j} = \frac{P_{jF}M_{jF}}{P_{jM}M_j} \frac{P_{jM}M_j}{C_j} \frac{C_j}{P_jQ_j}$, 其中, $\frac{P_{jM}M_j}{C_j}$ 为中间品成本在总

成本中的份额, 即 $\frac{P_{jM}M_j}{C_j} = \gamma$; $\frac{C_j}{P_jQ_j}$ 为企业平均成本, 记为 c_j 。在中国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广泛存在政府干预情况下, 要素成本往往被人为压低以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空间。王宁和史晋川 (2015)^[14]指出, 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存在实际要素价格低于其边际收益的负向扭曲问题。谭洪波 (2015) 和李力行等 (2016)^[15]也指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除存在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外, 还存在于土地市场; 地方政府以低地价或零地价来招商引资的做法, 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因而在中国要素市场中, 人为干预下的要素成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 c'_j 要小于有效市场的企业平均成本 c_j 。若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扭曲租”以 μ 表示, 竞争市场中的有效成本 c_j 与存在干预下的企业实际要素平均成本 c'_j 间的关系便可表示为 $c_j(1 - \mu_j) = c'_j$ 。则有:

$$\frac{P_{jF}M_{jF}}{P_jQ_j} = \frac{\gamma c'_j}{(1 - \mu_j)} \frac{P_{jF}M_{jF}}{P_{jM}M_j} \quad (3)$$

在给定劳动力和资本情况下, 企业通过选择国内中间品和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不同组合来实现成本最小化, 即: $\min_{M_{jD}, M_{jF}} P_{jD}M_{jD} + P_{jF}M_{jF}$, s. t. $M_j = [(\varphi_j M_{jD})^{\frac{\theta-1}{\theta}} + M_{jF}^{\frac{\theta-1}{\theta}}]^{\frac{\theta}{\theta-1}}$ 。进而可得到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占中间品总成本比重为:

$$\frac{P_{jF}M_{jF}}{P_{jM}M_j} = \frac{1}{1 + (P_{jF}\varphi_j/P_{jD})^{\theta-1}} \quad (4)$$

结合式 (2)、式 (3) 和式 (4) 可得到企业 j 的出口 DVAR 决定函数为:

$$DVAR_j = 1 - \frac{\gamma c'_j}{(1 - \mu_j)} \frac{1}{1 + (P_{jF}\varphi_j/P_{jD})^{\theta-1}} + \phi_i \quad (5)$$

式 (5) 意味着,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土地要素价格偏低会促使企业更多使用该要素进行生产和出口, 由此获得低成本优势和巨额出口收益, 因而土地资源错配可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1: 土地资源错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实际平均成本提升企业出口 DVAR。

与此同时, 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越多, 国内中间品价格就越低 (即相对价格 P_{jF}/P_{jD} 越高), 则企业出口 DVAR 就越高^①; 国内中间品效率越高, 则企业出口 DVAR 也越高;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大, 则企业出口 DVAR 就越低。因而, 国内中间品效率 (ϕ_j)、国内中间品价格 (P_{jD}) 或国内中间品种类 (I^D) 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μ) 也可成为连接城市层面土地资源错配和企业出口 DVAR 的纽带。

首先, 土地资源错配会通过弱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降低和减少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工业偏向性的“土地价格歧视”极大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生产成本, 使工业企业在低价工业用地中获得比服务业更多的“扭曲租”, 进而导致大量低效率工业企业更多因“地租优惠”而非纯粹市场效率而进入辖区投资 (李勇刚和罗海艳, 2017)^[16], 不利于企业创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李力行等 (2016) 指出, 多数城市为吸引流动性强的资本要素, 往往以低地价对重点行业 and 重点企业进行招商引资。如果产业政策偏离城市竞争优势和市场效率, 那么低效率企业更可能因为低地价选择进入城市, 不属于重点招商企业的高效率企业却因较高地价无法进入, 这也会对辖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弱化作用。此外, 如果工业企业在政府干预下获得了大量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并使得其生产成本明显降低, 那么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可能会因此降低, 并将更多富余资金用于雇佣大量劳动力和追加资本投资, 从而以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来替代风险更高、收益期限更长的创新投入, 降低企业技术进步水平。因而土地资源错配还能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而企业技术创新受到抑制, 直接结果便是不利于国内中间品使用效率提升, 进而降低企业出口 DVAR。不仅如此,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还可通过减少国内中间品种类降低企业出口 DVAR。一是国内中间品厂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会直接降低中间品新品种的研发能力, 减少中间品种类; 二是出口商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将不利于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从而减少对国内中间品的需求, 降低上游产业国内中间品品种的供给和质量, 进而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不利影响。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2: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降低和减少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 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DVAR 提升。

其次,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集聚效应的有效发挥降低和减少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一般而言, 在没有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的条件下, 企业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依据效率原则选择最优的区位集聚。这样的产业集聚更注重企业间的内在关联性 & 企业行为与当地比较优势的匹配性, 因而能够有效发挥集聚的经济外部性。根据集聚经济理论 (Marshall, 1961)^[17], 企业集聚可产生三方面的经济外部性: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 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劳动力“蓄水池”

^①由于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 因而可看作外生给定。

效应可通过提高劳动者与工作岗位间的匹配效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厂商对中间品的使用效率,从而直接提升企业出口 DVAR;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降低国内中间品价格,提升中间品种类、数量和质量,促使制造业企业间共享国内中间品市场,更多使用国内中间品进行生产和出口,从而提高企业出口 DVAR;技术外溢效应则有助于提升中间品厂商生产效率和出口企业对中间品的使用效率,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①,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促进企业出口 DVAR 提升。然而,在政治晋升和财政最大化激励下,大量企业为获得“土地优惠”而非市场效率不断向辖区集聚。由于并未遵循市场规律,这种通过土地政策优惠诱导形成的企业“扎堆式”集聚虽然能够短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税收收入快速提高,但却难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师博和沈坤荣,2013)^[18],不仅使产业集聚应有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效应随之降低,而且造成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曲福田等,2005)^[19],进一步降低了各地区产业的分工效率和集聚效应,抑制了制造业出口 DVAR 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3: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集聚效应的发挥,降低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DVAR 的提升。

最后,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要素配置状况,进而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影响。根据最优化原则,土地资源应同其他要素一起被合理配置于各个产业,以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要素配比合理有效,最大程度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由于土地与劳动力、资本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土地资源错配也使得大量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工业领域,使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也具有明显的工业偏向性(李力行等,2016)。其一,土地市场扭曲使工业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大规模工业用地,变相提升了工业企业盈利空间,致使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在逐利动机下“蜂拥”进入工业领域,最终导致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明显低于其边际收益,要素市场出现扭曲。其二,低价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还可使工业企业易于凭借这些土地获得大量抵押贷款,从而降低工业融资成本,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扭曲(谭洪波,2015)。其三,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在促进资本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陆铭和欧海军,2011)^[20],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则会加剧企业层面要素配置扭曲,并通过式(5)的传导机制直接降低企业出口 DVAR。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4: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将加剧企业层面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扭曲,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DVAR 提升。

^①从供给方面来说,技术外溢效应导致中间品厂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增加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从需求方面来说,技术外溢效应使得企业提高了中间品使用效率,进而增加对中间品的需求,需求规模扩大有助于中间品生产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

二、计量模型、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目的在于探讨城市层面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的影响。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出口 DVAR 的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ln DVAR_{jt} = \alpha_0 + \alpha_1 \ln dist_s_{vt} + \sum_m \beta_k x_{jt}^m + \sum_n \gamma_n X_{vt}^n + u_j + u_v + u_t + \xi_{jt} \quad (6)$$

其中， $DVAR_{jt}$ 表示企业 j 在 t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ist_s_{vt}$ 表示城市 v 在 t 年的土地资源错配状况， x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β 为企业变量的参数估计， X 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γ 为城市变量的参数估计， m 和 n 分别为企业控制变量和城市控制变量的个数， u_j 、 u_v 、 u_t 为企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ξ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度

1.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企业出口 DVAR 为企业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与企业总出口之比。本文借鉴张杰等 (2013)、Kee 和 Tang (2016)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8) 的思路，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企业层面出口 DVAR，即：

$$DVAR_j^U = \begin{cases} 1 - \frac{P_{jF} M_{jF,adj}^P}{P_j Q_j^P} - \frac{\delta_j^F}{EXP_j^P}, & U = P \\ 1 - \frac{P_{jF} M_{jF,adj}^O + \delta_j^F}{P_j Q_j^O}, & U = O \\ \kappa_0 \times \left(1 - \frac{P_{jF} M_{jF,adj}^O + \delta_j^F}{P_j Q_j^O}\right) + \kappa_P \times \left(1 - \frac{P_{jF} M_{jF,adj}^P}{P_j Q_j^P} - \frac{\delta_j^F}{EXP_j^P}\right), & U = M \end{cases} \quad (7)$$

其中， P 、 O 、 M 分别代表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 κ_0 和 κ_P 分别为混合贸易企业中一般贸易部分和加工贸易部分出口占企业总出口的比重。本文借鉴张杰等 (2013)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8) 的研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贸易代理商以及国内中间投入的间接进口问题。 $P_{jF} M_{jF,adj}^P$ 代表调整后的企业实际中间品进口额， δ_j^F 代表国内中间品中的国外价值成分， $P_j Q_j$ 和 EXP_j 分别代表企业总收入和出口。

2. 土地资源错配。本文所指的土地资源错配主要反映城市建设用地在工业领域的低价偏向性配置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状况。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边际产出法来测算土地资源错配指标。土地资源错配状况可用工业用地边际产出与其实际价格之比表示，即：

$$dist_s = \frac{MP_s}{r} = 1 + \tau_s \quad (8)$$

其中， τ_s 为土地资源错配的程度， r 为城市工业用地价格， $MP_s = \hat{\eta}_i \bar{Y}/S$ 代表城市工业用地的边际产出， $\hat{\eta}_i$ 为土地要素对城市工业增长的影响弹性， \bar{Y} 为城市工业增加值， S 为城市工业用地面积。若 $dist_s = 1$ 或 $\tau_s = 0$ ，表示工业用地不存在错配

现象; $dist_s > 1$ 或 $\tau_s > 0$ 表示工业用地应有价值大于实际价格 (即实际价格被低估), 土地资源呈现反向错配; $0 < dist_s < 1$ 或 $-1 < \tau_s < 0$ 表示工业用地应有价值小于其实际价格 (即实际价格被高估), 土地资源呈现正向错配。在计量模型中对式 (8) 取对数便意味着 $\ln dist_s = \ln(1 + \tau_s) \approx \tau_s$, 因而 $\ln dist_s$ 的系数便反映了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为获取各城市土地价格信息, 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土地市场网收集了 2006—2013 年全国 277 个地级市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完整地报告了各城市每年各类用途土地的用地项目名称、项目位置、供地方式、土地用途、行业分类、出让面积和成交价款等信息。本文按照土地用途将各城市每年供地方式为“招拍挂”的各项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款进行加总, 并通过计算成交价款和土地出让面积的比值得到城市工业用地的平均地价。

3. 相关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①企业规模 ($\ln size$), 用企业总资产来衡量; ②资本密集度 ($\ln cap$), 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年平均员工数来表示; ③融资约束水平 ($\ln rzys$), 以企业负债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来表示; 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 tfp$), 由式 $\ln tfp = \ln(y/l) - s \times \ln(k/l)$ 来测算, 其中 y 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k 表示企业固定资产总额, l 代表企业职工人数, s 为资本弹性系数, 本文借鉴许和连等 (2017) 的思路将 s 设为 $1/3$ 。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劳动力数量 (L) 以市辖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与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 (万人) 表示。城市资本存量 (K , 万元) 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FDI , 万元) 均使用基于 5% 折旧率的永续盘算法来计算。城市人口规模变量 (Pop) 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万人) 表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 (EDU) 以中学及以上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 表示。城市财政支出力度 ($Egov$) 以市辖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所有货币价值数据均以 1998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①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三套数据: 2006—2013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通过将企业层面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 得到 2006—2013 年 277 个地级市 92 036 个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测算企业出口 DVAR 的原始数据来自 2006—2013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遵循会计准则处理原始数据中的异常值和数据缺失问题^②。此外, 本文借鉴 Brandt 等 (2012)^[21] 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跨年份匹配。各贸易类型企业的实际进出口总额等各项原始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参考田巍和余森杰 (2013)^[22] 的做法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并利用 Kee 和 Tang (2016) 的方法处理了企业过度进口和过度出口的问题。

①因篇幅所限, 详细的控制变量测算过程以及各变量统计描述量备索。

②主要是删除缺失重要经济指标、人数少于 8 人、不符合会计准则、没有识别编号、成立时间无效或者早于 1949 年或者大于当前年份的企业。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计量模型检验结果,本文同时控制年份、城市与企业固定效应,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并对标准误进行聚类。结果见表1。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i>lndist_s</i>	-0.0243 *** (-10.70)	-0.0233 *** (-10.28)	-0.0187 *** (-7.84)	-0.0177 *** (-7.4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企业变量	城市变量	企业和城市变量
N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R ²	0.1113	0.1128	0.1148	0.1162

注:圆括号中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均控制年份、城市和企业固定效应,下同。

表1第(1)列显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土地资源错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可能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化集聚效应,进而降低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效率,以及通过加剧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而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的负向影响,超过了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的正向影响。第(2) — (4)列显示在分别控制企业层面、城市层面以及同时控制企业和城市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土地资源错配依然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更换核心变量替代指标,考虑极端值、外部冲击与内生性四个方面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指标变换方面,本文分别用工业用地价格偏离度^①、协议方式出让土地面积占总出让面积比重以及工矿仓储用地占总供地量比重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在考虑极端值方面,本文依次在企业出口DVAR双边缩尾与双边截尾2.5%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在考虑外部冲击方面,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2008年金融危机的年份虚拟变量及其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进行计量检验。在考虑内生性方面,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择方面,本文使用滞后二期的土地资源错配指标、城市平均地形坡度和平均海拔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的工具变量。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土地资源错配的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印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②

①工业用地价格偏离度 = (城市年均商服用地价格 - 城市年均工业用地价格) / 城市年均商服用地价格。

②限于篇幅,详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四、机制检验

为深入论证土地资源错配影响制造业出口 DVAR 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使用并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平均成本 ($\ln c'$)、企业层面劳动力配置扭曲 ($\ln dist_l$) 和资本配置扭曲 ($\ln dist_k$) 作用于企业出口 DVAR 的作用机制, 进而使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ln Tech$)、企业集聚经济效应 ($\ln AggM$) 等作用于国内中间品效率 ($\ln \varphi$) 和国内中间品种类 ($\ln I^p$)^①, 进而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影响的机制。表 2 报告了并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 3 报告了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

表 2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DVAR 的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中介变量为 $\ln c'$		中介变量为 $\ln dist_l$		中介变量为 $\ln dist_k$	
	(1)	(2)	(3)	(4)	(5)	(6)
方程类型	$\ln c'$	$\ln DVAR$	$\ln dist_l$	$\ln DVAR$	$\ln dist_k$	$\ln DVAR$
$\ln dist_s$	-0.0842 *** (-3.56)	-0.0198 *** (-8.66)	0.0572 *** (4.16)	-0.0073 *** (-2.95)	0.0496 *** (2.71)	-0.0085 *** (-3.14)
$\ln c'$		-0.0219 *** (-3.28)				
$\ln dist_l$				-0.0322 ** (-2.37)		
$\ln dist_k$						-0.0237 *** (-3.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2 036	92 036	82 637	82 637	82 637	82 637
R ²	0.0542	0.1175	0.0735	0.0982	0.0693	0.1022

表 2 中中介变量为企业平均成本 ($\ln c'$) 时, 第 (1) 列估计结果说明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显著降低了企业平均生产成本; 第 (2) 列结果说明了企业平均生产成本上升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 DVAR 的提升。进一步地, 第 (1) 列 $\ln dist_s$ 和第 (2) 列 $\ln c'$ 的系数乘积与第 (2) 列 $\ln dist_s$ 的系数异号, 说明存在遮掩效应, 即土地资源错配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对制造业出口 DVAR 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 遮掩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DVAR 的负向影响。

将中介变量更换为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ln dist_l$) 与企业资本配置扭曲 ($\ln dist_k$) 时, 第 (3) 列和第 (5) 列显示土地资源错配显著加剧了企业劳动力及资本配置扭曲程度。第 (4) 列和第 (6) 列结果说明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与资本配置扭曲程度提高均会阻碍企业出口 DVAR 的提升。第 (4) 列和第 (6) 列中, 土地资源错配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且第 (3) 列 $\ln dist_s$ 和第 (4) 列 $\ln dist_l$ 的系数乘积与第 (4) 列 $\ln dist_s$ 的系数、第 (5) 列 $\ln dist_s$ 和第 (6) 列 $\ln dist_k$ 的系

①限于篇幅, 各中介变量的测算方法、数据来源备索。

数乘积与第(6)列 $\ln dist_s$ 的系数符号均为负,说明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和资本配置扭曲在土地资源错配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 DVAR 提升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印证了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加剧其他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进而抑制企业出口 DVAR 提升的作用机制。

表3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DVAR 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 $\ln\varphi$				中介变量为 $\ln I^D$			
	(1)	(2)	(3)	(4)	(5)	(6)	(7)	(8)
方程类型	$\ln Tech$	$\ln AggM$	$\ln\varphi$	$\ln DVAR$	$\ln Tech$	$\ln AggM$	$\ln I^D$	$\ln DVAR$
$\ln dist_s$	-0.0298*** (-3.04)	-0.0162** (-2.45)	-0.0547*** (-4.57)	-0.0129* (-1.71)	-0.0298*** (-3.04)	-0.0162** (-2.45)	-0.0640** (-2.52)	-0.0081 (-0.94)
$\ln\varphi$				0.0418** (2.23)				
$\ln I^D$								0.0383*** (2.98)
$\ln Tech$			0.0380** (2.04)	0.0204** (1.97)			0.0401*** (3.65)	0.0211* (1.75)
$\ln AggM$			0.0416** (2.44)	0.0159* (1.87)			0.0352*** (4.64)	0.0169** (2.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R ²	0.0930	0.1008	0.1032	0.1079	0.0930	0.1008	0.0541	0.1084

表3第(1)列和第(2)列^①显示,土地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空间集聚效应。当中介变量为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ln\varphi$)时,第(3)列显示企业创新水平($\ln Tech$)的提高和空间集聚效应($\ln AggM$)的发挥有助于提升企业中间品效率。第(4)列中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的参数估计显著为正,表明土地资源错配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水平和空间集聚效应,进而降低企业中间品效率,并最终对企业出口 DVAR 产生抑制作用的链式中介效应得到印证。第(4)中 $\ln dist_s$ 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第(1)、(2)列中 $\ln dist_s$ 的系数分别与第(3)列中 $\ln Tech$ 、 $\ln AggM$ 的系数以及第(4)列中 $\ln\varphi$ 的系数乘积符号和第(4)列中 $\ln dist_s$ 的系数符号一致,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水平和空间集聚效应,降低了企业中间品使用效率,进而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 DVAR 的提升。

当中介变量为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数($\ln I^D$)时,第(7)列结果显示企业创新($\ln Tech$)和空间集聚($\ln AggM$)水平提升均显著增加了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第(8)列中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数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 DVAR,从而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国际贸易利得。可见,存在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和空间集聚效应进而降低企业国内中间品种类数,并最终阻碍

①或者表3第(5)列和第(6)列。

企业出口 DVAR 提升的中介效应。第 (5)、(6) 列中 $\ln dist_s$ 的系数分别与第 (7) 列中 $\ln Tech$ 、 $\ln AggM$ 的系数以及第 (8) 列中 $\ln I^D$ 的系数乘积符号和第 (8) 列中 $\ln dist_s$ 的系数符号一致, 但第 (8) 列中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即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和空间集聚降低了企业国内中间品种类数, 从而阻碍制造业企业出口 DVAR 的提升。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基于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的进一步分析

由于地方政府增长竞争及财政最大化是导致土地资源错配进而抑制制造业出口 DVAR 提升的重要原因, 本部分进一步在式 (6) 中引入地方政府增长竞争、财政最大化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 以探讨二者对制造业企业出口 DVAR 的协同影响。我们通过手工搜集 2006—2013 年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目标数据, 用每个城市年初的经济增长目标与该城市所在省份增长目标的比值 ($Targ$) 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成长竞争程度。除此以外, 本文还用商住土地出让收入占 GDP 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最大化而通过偏向性配置土地来实现的财政收入份额 ($Czmx$)。本文使用网络爬虫技术得到的每笔商服和住宅类土地出让价款进行加总得到城市层面的商住土地出让收入数据, 然后计算其与 GDP 的比重。表 4 的第 (1) — (4) 列报告了引入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指标后的估计结果。

表 4 基于增长竞争、财政最大化和土地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项目	基于增长竞争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财政最大化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土地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1)	(2)	(3)	(4)	(5)	(6)
$\ln dist_s$	-0.0162 *** (-9.57)	-0.0143 *** (-8.06)	-0.0075 ** (-2.53)	-0.0084 ** (-1.97)		
$\ln Targ$	-0.0347 *** (5.24)	0.0169 (1.53)				
$\ln Targ \times \ln dist_s$		-0.0439 *** (-5.72)				
$\ln Czmx$			-0.0317 * (-1.80)	-0.0144 (-0.52)		
$\ln Czmx \times \ln dist_s$				-0.0327 ** (-2.00)		
$\ln LMS$					0.0225 *** (6.83)	
$\ln LMA$						0.0211 *** (4.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2 036	92 036	92 036	92 036	89 908	89 908
R ²	0.0935	0.1003	0.0841	0.0922	0.0447	0.0444

表4第(1)、(3)列分别报告了加入增长竞争与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GDP比重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土地资源错配的参数估计依然显著为负,城市间增长竞争程度以及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对制造业出口DVAR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增长竞争与财政最大化抑制了制造业出口DVAR的提升。当在第(2)、(4)列中分别加入增长竞争、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GDP比重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后,增长竞争、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GDP比重与土地资源错配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增长竞争程度的提升和财政最大化不仅是促使地方政府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导致建设用地错配的重要原因,而且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DVAR的抑制效应。

(二) 基于土地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从土地资源错配的反面即土地市场化角度,来探讨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机制。如果土地市场化的确显著推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价值攀升,那么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系列负向影响则可通过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来得到缓解。本文根据徐升艳等(2018)^[23]的做法,使用土地招拍挂宗数占土地出让宗数比重(LMS)和土地招拍挂面积占土地出让面积比重(LMA)两个指标来衡量土地市场化水平。表4第(5)列和第(6)列显示,两个土地市场化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土地市场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真实贸易利得,证实了土地市场化改革能够通过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三)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DVAR的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的检验。根据表5中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土地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中等及以上城市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但未对西部地区、小城市企业出口DVAR产生明显影响。

表5 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7)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型及以上大城市	II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Indist _s	-0.0103*** (-4.34)	-0.0141* (-1.75)	-0.0084 (-0.64)	-0.0089* (-1.84)	-0.0152*** (-3.02)	-0.0277** (-2.01)	-0.0088 (-1.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5 883	4 431	1 722	12 985	63 689	13 945	1 417
R ²	0.0490	0.0124	0.0386	0.0395	0.0542	0.0408	0.0401

2.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根据表6中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土地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各类贸易类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出口DVAR,但对国有企业尚未产生明显影响。

表6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项目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i>Indist_s</i>	-0.0332*** (-3.96)	-0.0398*** (-25.82)	-0.0352*** (-12.77)	-0.0071* (-1.83)	-0.0253*** (-5.77)	-0.0382 (-1.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 601	35 017	39 418	35 228	16 732	624
R ²	0.0253	0.0195	0.0200	0.0350	0.0121	0.066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土地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以及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和保障,其配置方式与配置效果势必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出口行为,进而对企业出口DVAR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土地资源错配这一新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的现实困境,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基于2006—2013年27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中国土地市场网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从而使得工业用地呈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特征。(2)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且该结论在进一步更换测度指标、考虑极端值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3)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弱化集聚效应以及加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而产生的综合作用的结果。(4)地方政府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而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则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5)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本文结论对于依托土地资源错配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进而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有重要政策启示。(1)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行为是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因而要转变现有官员干部考核体系,打破“唯GDP论”的桎梏,强调城市发展质量与长远发展前途而非过分重视城市短期经济利益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以扭转地方政府将城市建设用地过度配置于工业领域的倾向。(2)进一步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错配中的主导性作用,通过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促进建设用地在不同产业和用途间优化配置。目前,在建设用地配置的多数领域,市场化的“招拍挂”出让方式尽管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但政府依然可以利用自身在土地一级市场中的绝对支配权干预土地供给,使其向着有利于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推进土地

市场化改革,需要在土地一级市场中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地位,而地方政府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纠正土地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部分,引导土地资源向着市场效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以此扭转土地资源偏向性配置趋势,提升土地资源配效率,促进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3)应针对不同地区与不同规模城市采取差异化的土地资源配策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而言,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以市场化导向促进建设用地有效配和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依托经济规模和市场化优势继续推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提升;对于中部地区和中等城市而言,应着力创新土地使用机制,促进有限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配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空间、提升产业集群发展质量,使技术创新和集聚效应成为促进制造业企业附加值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西部地区和小城市而言,在吸引企业投资、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应培育更多有利因素,充分挖掘并依靠当地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发展的特色产业,依据特色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培育产业发展环境、提高产业承接质量、壮大产业发展基础,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合理规划、使用城市建设用地,从而实现“地尽其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参考文献]

- [1] 张杰,刘元春,郑文平.为什么出口会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基于政府行为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3(6):12-27+187.
- [2] KEE H L, TANG 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6): 1402-1436.
- [3] 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2016(3):151-162.
- [4] 杨其静,卓品,杨继东.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4(11):24-34.
- [5] 谭洪波.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5(12):96-105.
- [6] 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62-80.
- [7] 吕越,盛斌,吕云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5):5-23.
- [8] 毛其淋,许家云.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J].经济学(季刊),2018(4):1453-1488.
- [9] 李胜旗,毛其淋.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7(3):57-69.
- [10] 高翔,刘啟仁,黄建忠.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机制[J].世界经济,2018(10):26-50.
- [11] 毛其淋,许家云.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J].世界经济,2019(1):3-25.
- [12] 许家云,徐莹莹.政府补贴是否影响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视角[J].财经研究,2019(9):17-29.
- [13] 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 (12): 3660-3703.

- [14] 王宁, 史晋川.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9): 149-161.
- [15] 李力行, 黄佩媛, 马光荣. 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 [J]. 管理世界, 2016 (8): 86-96.
- [16] 李勇刚, 罗海艳. 土地资源错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 ——来自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 [J]. 财经研究, 2017 (9): 110-121.
- [17]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M]. London: Macmillan, 1961.
- [18] 师博, 沈坤荣. 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 [J]. 管理世界, 2013 (10): 6-18+187.
- [19] 曲福田, 高艳梅, 姜海. 中国土地管理政策: 理论命题与机制转变 [J]. 管理世界, 2005 (4): 40-47.
- [20] 陆铭, 欧海军. 高增长与低就业: 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1 (12): 3-31.
- [21] 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2): 339-351.
- [22] 田巍, 余森杰.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3 (1): 28-44.
- [23] 徐升艳, 陈杰, 赵刚. 土地出让市场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 44-61.

(责任编辑 白光)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xport Value Climb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N Feng ZHUANG Zongwu XIE R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27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land market transaction data from China land market website from 2006 to 2013, this paper calculated urban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index, and used the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firms and customs trade database to calculate export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n tried to discuss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value climb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reverse misallocation tendency that the deserved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e actual pric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 China. This reverse misallocation can reduce export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manufacturing significantly through mechanisms of inhibiting firm's innovation ability, weaken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as well as aggravating firms' factors allocation distor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growth competition and fiscal maximiz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manufacturing in export. The impact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manufacturing in export has obvious heterogene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trade type, ownership type, region and city level of the firm. The above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further land marketization refor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aintain manufacturing's rapid growth as well as to increase added-value of export products at current stage.

Keywords: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xport Domestic Value-added of Firms; Biased Allocation; Land Marketization Reform